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8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POUR UN MONDE MUTIPOLAIRE /
POUR LA CINQUIEME INTERNATIONALE

[埃] 萨米尔·阿明/著
(Samir Amin)

沈雁南 彭姝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POUR UN MONDE MUTIPOLAIRE /
POUR LA CINQUIEME INTERNATIONALE

〔埃〕萨米尔·阿明/著
(Samir Amin)

沈雁南 彭姝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埃及)阿明(Amin, S.)著;沈雁南,彭姝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1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7-5097-5801-4

I. ①多… II. ①阿… ②沈… ③彭…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
②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091.6 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8707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8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著者/[埃]萨米尔·阿明

译者/沈雁南 彭姝祎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祝得彬

责任编辑/陈 荻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3.75 字数:262千字

版次/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5801-4

著作权合同

/图字01-2014-2351号

登记号

定价/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Samir Amin

POUR UN MONDE MUTIPOLAIRE/POUR LA CINQUIEME INTERNATIONAL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language edition by
Samir Ami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法文版译出。

译者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急剧变革的年代，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在全球化急速发展的今天，即使在世界最边缘地区，人们恐怕也不得不考虑世界将走向何方的问题。或许大多数人还在为每日的衣食住行操劳，无暇顾及这样过于宏观和“遥远”的事情；或许有那么多人因文化和地位等原因而无力、无心思考这种问题，但他们却也无法逃避世界变化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因此，世界的变化，国际社会的重建，无疑是关乎每个地球人今后如何生存的重大问题，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人们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的解体，作为世界变化和国际社会进入重组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仅仅是事物长期以来厚积薄发找到的突破口，宛如岩浆在地底下涌动已久终于在这个火山口喷出。事实上，世界的变化早在此前就已经悄悄地发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的急剧膨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等等，预示着地球上这个国际社会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了。于是，国际社会便以冷战格局的解体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重组时期；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溃散不幸成为国际社会转型的牺牲品，个中自有其具体的各种因缘，对此我们暂且不

论。即使所谓冷战的胜利者，也未必是它们自诩的那样大获全胜。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从两霸相争走向群雄逐鹿的时代，是旧的游戏规则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游戏规则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甚至有人称为“无政府主义”时代。因此，这绝非是冷战胜利者所理想的时代，尽管它们占有着很大优势，并希望借助这种优势建立起符合其理想的新规则。但是，新的竞争对手正在现身，并希望通过参与新规则的制定巩固其发展的地位。同时，冷战胜利者队伍里也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欧洲国家因“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而陷入一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停业整顿”状态；日本则因耿耿于怀其战败国地位而借中国钓鱼岛问题蠢蠢欲动，以打破“二战”后的体制安排，重振其军事和政治大国的“雄风”，走出日益低迷的经济困境。溃散阵营里的各个国家纷纷转轨，寻找新的方向；所谓胜利阵营的各国也因为“唯一”强大对手消失而重新自我定位，仿佛外来压力的减弱使得物体内部组织出现了松散，尽管敌人可能是更多了，但却因为定位不同而使力量更加分散了。国际社会一时风起云涌，幻象迷乱。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关系的研究便成为当下显学，各种学说层出不穷，现在的国际问题研究大概是自其形成专门学科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

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从摩根索、沃尔兹、基欧汉、温特、沃勒斯坦到阿明等学术大家，不仅对当代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从各种不同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剖析和解释，而且还提出各种世界治理的思想，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应当承认，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兴未艾之

际，这些思想理论对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充实作用。特别是以往重视不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说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得到更多关注，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界来说，更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萨米尔·阿明是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全球化问题、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世界治理发展方向和如何构建理想的新型国际体系的思路。与一般国际关系学者相比较，阿明似乎特别关注国际社会中的“阶级性”问题。本书是阿明集中讨论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转型问题的专著之一，也是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讨论国际问题的典型著述。

同时作为一位全球化问题的学者，阿明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社会体内，一国之外交思想和政策更多的是代表着其执政者背后的各种资本的利益。因此，国际社会如何构建，反映的是国际社会中被压迫、被统治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统治阶级的斗争。在阿明看来，美欧日三角组合类似于这个国际社会中的黑社会，故他称为“三合会”（港英时期的香港黑社会），是为背后的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是一种强权势力，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一种“集体帝国主义”。它们管理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经济领域，通过其代理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欺行霸市；在政治领域，则通过北约行使权力，甚至有取代联合国的趋势。阿明认为，（在冷战后北约责任）被重新定义后实际上它可以用来取代联合国。因此，针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全球化，阿明提倡的是

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并用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念来阐释他的全球化思想。

除了对集体帝国主义进行批判和揭露以外，阿明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在世界其他国家里，不同的国家也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如在俄罗斯，新的领导阶级来源于“寡头政治”，这个阶级通过私有化的国家转型而一夜暴富，并通过石油收入、拆分工业和国家进口市场佣金而继续拥有财富。因而阿明认为这个阶级具有买办资产阶级的特点，由此也决定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或者俄罗斯可以通过内部社会变化和民主进程，得到真正的复兴，并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者它继续走目前的道路，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样俄罗斯就仍然难以避免被三合会国家挤入“拉美化”的困境。

至于印度，阿明对其是否能跻身于21世纪崛起的大国行列表示怀疑。他认为，使印度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由于英国殖民统治从根本上将印度改造成一个附庸的资本主义农业国家，通过农业土地私有化将大多数农民排斥在外，导致形成一边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阶级和相对富裕的中农阶级，一边是大多数的贫穷农民。阿明认为，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解决它所面临的严重挑战，特别是土地问题。如果不经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印度就不可能跻身现代化强国。因此，无论这个国家是否被认为实际上已经买办化，它仍将属于边缘的资本主义国家。

阿明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国家阶级属性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对国际社会进行分析的基础，认

为在当今资本主义体系中，一种帝国主义的传统仍然在主宰着中心/发达国家和边缘/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在所谓“社会主义失败”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大变局后，追逐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种时髦，但是追随者的资本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它们的边缘属性，如果不进行根本上的社会变革或者社会革命，它们就将继续是中心国家（集体帝国主义）剥削的对象。因此，阿明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阶级属性；在现阶段则是寄希望于发展中国家（即南方国家）的团结，粉碎以美国为首的集体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

阿明在诸多论述中一直强调，当代世界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来源于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规律，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发展的经济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脱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的必然发展趋势。在本书的序言中，阿明特别对他所用的“多极世界”的概念做了说明。他认为，仅仅将“多极世界”用于解释美日欧等中心国家，甚而包括中国及俄罗斯、印度、巴西的关系协调是完全不够的，他所谓的“多极世界”是应该包括全体人类和所有国家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多极化。由于对“理想”的全球化形式（单极、分等级的多极、不分等级的多极）所做的选择是和某一国家所希望实行的社会模式（自由资本主义、另类的“社会”资本主义及其他的社会主义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任何“标准的”（即基本上是自由的）资本主义选择，都意味着在南北关系上的帝国主义态度。

对此，阿明持坚决的反对态度。阿明明确标榜其对多极世界和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自称是反帝国主义的激进理念。他认为，必须改变南北关系中生产条件的巨大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是五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他提出的这种矫正是在超越资本积累基本逻辑意义上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和现实中其他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思潮的一种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理念。

同时，阿明通过对充满社会矛盾的各种社会进行观察，分析这些社会矛盾对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影响，指出社会主义多极化理念的积极意义及世界治理的可行性发展趋向。《多极世界》运用社会主义理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行为体进行深入、独到的阶级分析，这对于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理论流派，无疑是一种鲜明的批判。因此，阿明的理论学说及其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世界，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应该是我们学界对待世界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应有的态度。

阿明不仅对全球化、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是当今世界问题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左翼学者和思想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年轻时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曾经担任过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任教和就职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和联合国在达喀尔的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从1980年起，阿明担任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现为第三世界

论坛理事长、替代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丰富的生活和工作阅历，以及涉猎复杂的多学科和广泛的研究领域，使他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思想深度。

阿明曾经在 1955 年出席中国积极推动并派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的万隆会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浓厚兴趣，他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有着密切联系，其著述多有论及中国。阿明高度赞扬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积极影响。在上编《多极世界》中专门有一章分析中国。阿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堪称“奇迹”。但与主流看法将其仅仅归功于市场效果和对外开放不同的是，阿明还关注 1949 年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段历史时期基础建设的贡献。他写到，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取得增长率两倍于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阿明特别强调，没有此前形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奇迹”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在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中，阿明是比较强调中国革命的积极遗产的。

但是，阿明对中国未来何去何从感到的担忧在书中也不无流露。他认为，在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选择，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并据此而有三个可能出现的“场景”（或称为模式）：1. 国家分裂和沿海地区买办化；2.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3. 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将互为补充和相互冲突的市场资本主义逻辑和社会主义逻辑结合起来，并将这种社会主义逻辑纳入社会主义长时期发展的前景中。

当然，阿明认为第一种场景是对帝国主义战略有利的，但这种选择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受“三合会”的帝国主义发展逻辑

控制并成为边缘国家的命运。他认为，进步的选择只能建立在优先扩张内部市场上，建立在调整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和地区的不平等。与之形成对比的选择是，主要在经济发展的驱使下，不断地深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去。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的不平等，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就这些方面来看，取舍余地非常狭窄，除了选择“民族资本主义”外，它有望使中国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新的强国，甚至成为能迫使那些现在的超级大国放弃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但是任何一种内在选择余地有限的政治权力，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它的航向都是很难的，它或者会倒向右边（并以服从帝国主义计划而告终），或者倒向左边（向第三种场景演变）。

阿明的分析就其理论依据所自有的逻辑而言不无道理，但就其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分析则是值得商榷的。诚如阿明所重视的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并非横空出世的来自某人或某些人的神来之笔，而是由其自身内在历史发展所使然的。其中，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百多年来饱受内忧外患的苦难经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多重复杂因素纠结其间，加之受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其改革开放所处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固然中国不大可能完全摆脱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用一般模式来套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不可取的。不论其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或是像阿明这样对中国友好的思想批评家，理想主义的愿望终究并不能代替现实。客观地来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或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就其社会现实，或就其经

济规模，或就其起步基础，等等而言，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确为古今中外无前例可循的。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们特别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和实事求是的行事方式，我以为这绝非是“官样文章”，而是具有深刻含义的。当然，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对其性质进行评判，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其实这也远非一两篇文章甚至一两百部著作所能论证得了的。也许需要时隔若干个十年和若干代学者才能更清晰地予以深入分析和准确评判。本文仅想在此向读者说明，阿明在上编“多极世界”中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尽符合真实，因此其所做的判断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阿明的分析及其所依据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不同的见解是可以讨论的。正如阿明在本书序言中所言，“……论题是开放的，可以在对体系现实的分析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和他们的愿景上有各种不同看法。”我以为，阿明的书的确提供了讨论的路径和平台，尽管阿明的结论还有一些不为读者所能接受之处，但他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见解对于中国读者认识当今的世界来说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借鉴意义。

上编“多极世界”译者为沈雁南，下编“第五国际”译者为彭姝玮，特此说明。

沈雁南

序 言

本书的书名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的确如此，我希望建设一个多极世界，这当然就意味着以“全球军事控制”为特征的华盛顿霸权主义计划的失败。直截了当并毫不隐瞒地说，我认为，正是这个疯狂同时也因此而必然是罪恶的计划，将世界推入没完没了的战争中，尤其使南方国家民主和社会的进步失去任何希望；对北方国家也一样，即使表面上看没有那么严重。我从1991年的《混乱的帝国》起，就开始写这个问题了。

现在，需要对我用的这个词——“多极世界”——做些说明。如同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各种词语一样，“多极世界”也从来没有被明确地定义过，现在依然如此。对我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承认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体系不仅确实是“世界性的”（按不规范的英式法语是“mondialisé”、“globalisé”^①），而且对这个体系（即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甚至极而言之是“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上的）的任何方式的选择，本身也只能是完全同样的“世界性的”。换句话说，我正是人们所说的“有选择的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反对任何全球化的“反世界主义

^① “世界化的”、“全球化的”。——译者注

者”——这不仅不符合我的事实，而且也并非我所希望的。

分歧主要在于人们对“多极”的理解不一样。一部分人认为，“多极”只是保证“三合会^①”的每个搭档——包括欧洲（欧盟及其主要国家）和日本——与美国在主导世界事务方面拥有同等的地位。换句话说，这是“大西洋主义的再平衡”。某些人承认，在这种再平衡之外，同样也应该考虑到与其他大国保持一种协调——人们特别会想到中国及俄罗斯、印度和巴西——有时甚至还包括某些南方国家，即那些或多或少地被看作“初露头角”或可能会“初露头角”的国家。

对我来说，这样的“多极”完全不够，它不能令人满意地应对各国人民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并创造社会进步的条件；而没有社会进步，民主化进程很难有牢固基础。我的“多极”观念是必须全面彻底改变现在的“南北关系”。这种改变必须创造一种能够削弱强权势力的环境，这些强权势力正在使（如其所名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日趋严重。照我看来，这种改变将会对“帝国主义”传统——不论这个词是否讨人喜欢——提出挑战，并通过对帝国主义的质疑，进而从根本上质疑资本主义。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与传统经济学家对市场全球化所想象的体系完全不是一回事）中，这种帝国主义传统主宰了中心国家/边缘国家的关系。不过，我一开

① 原文为 Triade（英文为 Triad），有化学术语中“三素组”和音乐术语中“三和弦”等意，在有的情况下也被译为“三组合”。但历史上香港英国殖民当局也称香港黑社会组织“三合会”为“Triad”（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4%B8%89%E5%90%88%E6%9C%83>），从本书作者对美欧日等国组合的评价来看，借用此名显然有讽刺美国称霸世界之意。故认为译为“三合会”较为贴切。——译者注

始就要明确的是，在与任何拒绝追随美国霸权主义单边计划的人进行的政治讨论中，我的论题是开放的，可以在对体系现实的分析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可能性和他们的愿景上有各种不同看法。

资本主义打造世界体系的理念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新的问题，这种理念与各国社会向资本主义演变中或多或少取得的进展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更不能相提并论。追溯到 1954 ~ 1955 年，我写的第一部专著，就题为《世界规模的积累》。

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理念仍然是我关于“改变世界”的斗争目标的分析和主张的核心问题。篇幅所限，在此不容赘述我已经写过的对此问题的讨论。但是，我可以将我结合资本主义扩张提出的、认识现代全球化的四大发展阶段的结论概述如下：（1）“重商主义”阶段（1500 ~ 1800 年），在此期间，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体系是由大西洋的欧洲，通过对美洲的征服和改造、贩卖黑奴和（紧随非洲之后）对亚洲开始的商业入侵建立起来的；（2）“古典主义”阶段（1800 ~ 1950 年），世界体系建立在工业化中心国家与非工业化边缘国家之间形成鲜明对照的基础上（并伴随着迫使边缘国家政治地位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展的趋势）；（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阶段（1950 ~ 1980 年），在此期间，各边缘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或社会主义革命，我理解为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终于迫使世界体系中旧的不对等关系发生了改变，并进入工业化时代。这个“谈判”的全球化时期很特殊。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是人们已知的历史上发展最为强劲的时期，发展遍及了整个世界，分布也较为平衡；（4）当前是新的世界体系形成的新

时期，这个新的世界体系的特征——从更长远来看——是我所说的“五极并存（cinq monopoles）”，在此期间，中心国家（三合会）完全受它们在体系重建中的利益所支配。

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体系本质上是永远追求极化（polarisant）的（实际上是“全球化价值法则”在起作用，在我看来，这个法则与“简单价值法则”^①是有区别的）。根据我的分析，极化和帝国主义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我并不把帝国主义这个形容词仅仅用于以使一个民族服从另一个民族为目的的政治行为，人们可以从人类经历的各个时期中看到，这些政治行为是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有关联的。我作此分析的兴趣，仅仅在于证明，当代帝国主义乃是资本扩张内在逻辑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常态特征，这种扩张自资本主义产生起到今天，就一直在进行着有利于中心国家的财富和权势的极化（polarisation）。使中心国家在构建其体系与边缘国家不对称关系中受益的各种“极（les monopoles）”，决定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历史上每个时期的特点。

从工业革命（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个极是工业，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就等同于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我们知道，边缘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从一种“追赶”的观点出发，强调优先发展工业。民族解放运动纷纷取得的成功，迫使帝国主义做出调整以适应形势需要。但

^① 原文为“loi de la valeur tout court”。